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探索书系

形而下

高纪洋 著

——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

.....



山东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探索书系

形而下
——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

高纪洋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下: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高纪洋著.

—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12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探索书系)

ISBN 978-7-5330-5522-6

I. ①形… II. ①高… III. ①古器皿—造型艺术—研究—中国 IV. ①K8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1948号

本书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资助项目

策 划:刘传喜

责任编辑:韩 芳 郭征南

装帧设计:李 玥

设计指导:王承利

主管单位: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sdmscbs@163.com

电话:(0531)82098268 传真:(0531)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电话:(0531)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6开 20.25印张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序一

典范长存的中国器皿造型样式

张朋川

中国人向来讲究饮食之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将饮食之道视为休闲养生的大事。于是菜有系，茶有谱，酒有经，器有式，在饮食的色、香、味、形的美感中享受日常人生。然而色会衰，香会散，味会淡，形形色色的饮食器皿却传延至今，与我们长相厮守。

我对中国古代器物造型的研究情有独钟，曾在《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一文中说：“建立中国古代器物造型谱系是中国美术考古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化上保持着连贯性，许多器物很有特色，相延发展了数千年。”在中国古代器物中，日用的器皿与人们生活联系最紧密，各种造型样式的器皿也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尤其是各式各样的饮食器皿，给人们增添了生活的兴味。

中国的饮食器皿很有特色，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饮食，认为民以食为天，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陶器，就以碗、钵、盆、细颈瓶等饮食器皿为主。中国古代器皿造型的样式变化，是在上下一万年的历史经度和幅员广大的地域纬度中进行的，兼收并蓄地汇聚了农业和牧业的饮食文化，历史上又经过从分餐制到合餐制的变化，使器皿的类型和样式发生了递进式的变化，最终中国器皿造型的样式自成体系而又丰富多彩，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高纪洋以“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命题，使我感到欣然，因为长久以来我认为这是贯穿中国人饮食生活的发展变化的课题，并且相信他能够胜任这个重要的设计学课题的研究。高纪洋生长在学风淳厚的农民家庭中，他弟兄二人都获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高纪洋学习刻苦努力，以优良的成绩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美术学硕士学位，得到名师李福顺的指导，有着坚实的美术理论基础。继而又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攻读设计艺术学博士学位，学习和掌握了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期间考察了中国古代器皿的大量的实物资料，对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经多年努力，三易其稿，又经多次修改，完成了这部关于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研究著作。

这部著作的撰写是具有宏观眼光的，首先阐释了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分期问题。不是采用通常的王朝断代法，而是根据器皿造型样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使用功能和生产技术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来进行分期，前后连贯的各期的起、承、转、合十分清楚，对各段各期的转折变化解析得十分清晰。前半段是由新石器时代经商周至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器皿造型样式发生了从原始型到礼器型又转为实用型的变化；后半段是以农业为主的汉文化的器皿与以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器皿不断地整合的过程，最终中国器皿造型

样式走向成熟和定型。这种依据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特殊的发展规律进行的分期，是令人信服的，也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高纪洋在这部著作中客观地分析了影响器物造型样式的多方面的原因，功能、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宗教、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等因素，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器皿造型样式产生作用，从整体上去分析了影响器物造型样式的原因，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综合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客观和较全面的。

书中论析的“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记录、传播与变革”这一章节，是很有新意而又有学术价值的，翔实地论述了造型样式在不同材质器皿间的转移，从纵向、横向和隔代传播做了分析，为造型样式的研究扩展了新的视角。

最后，作者在书中对饮食器皿中具有代表性的碗和壶，分别进行了造型样式谱系的研究，把设计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这两种器型样式发展的坐标，正确地阐述了器皿各部分的演变轨迹，为器皿造型样式谱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使这本专著既有宏观的思想框架，又有具体的个案分析，成为一本有观点的具有许多研究心得的专著。

对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研究是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研究课题，书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较多，因此这本专著的出版远不是研究的结束，而是向读者展示了进行古代器皿造型研究的稳健的起式，以及蓄势待发的后劲。我们可以期待他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序二

潘鲁生

器，不仅是人们日常使用之器皿器物，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从老子《道德经》关于“器”的有无之辩、孔子的“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到近代洋务运动“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和谭嗣同之“器，体也”，“器”的意义超过了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与深层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器”作为造物的存在，借由物的形态，承载着从生产工艺、生活习俗到符号寓意、审美意象以及社会整体的思想文化等深层内涵。

器与道，其实是中华民族生活方式使然。一个历史时期的器具是一个时代的文明标志，其形制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符号。从原始彩陶审美与造型的自觉，到青铜时代重器传递神权和祖先崇拜的价值风范，及至陶瓷延续中华文脉传承，借釉与玉之质地与人格比附相称，造型语言也从陶器之“圆”、青铜之“方”发展为方圆相容。审美与功用、生产和生活、人格追求与生活应用融于器皿之中。一部器具器皿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一部文明发展史。

所以，选取中国古代器皿这一课题很有意义，当然也有不小的研究难度。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器皿浩如烟海，想要概括出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出错综复杂的器皿造型样式之间的关系，总结器皿造型样式发展的规律，找到它们记录、传播、变革的途径和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背后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变化，受到了包括实用、政治、经济、工艺、地理、宗教、生活方式、审美风尚等在内的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在器皿造型样式上又有怎样的对应表现，也需要厘清。而且从“汙尊杯饮”的原始社会开始，中国古代社会丰富多样的器皿同每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涉及审美方式和材质技术，也涉及完整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关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需要深入剖析和把握。因此，这一课题富有学术价值。

高纪洋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以历史遗存的文物和图像为主要线索，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探讨、研究和论证。不但对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演进、变革、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也对这些器皿造型样式与相关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完成了这一专门针对古代器皿造型样式进行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它的出版，将为我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高纪洋在山东大学随我做博士后研究，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的继续研究。

该博士论文曾得到导师和知名学者的较高评价，并被评定为优秀论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又有一定提升，并参与了泰山学者艺术学团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合相关研究，在这部书的深化上他下了不小的功夫，资料扎实而翔实，学术论证比较全面系统，逻辑性较强，文献征引符合学术规范，体现了良好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特向大家推荐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并希望学界同仁给予指导。

是为序。

甲午大雪于历山作坊

导 言

一、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

（一）选题的缘起

在中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当中，器皿是一个有着广泛而深刻内容的研究对象。以饮食器为主体的器皿，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每个人生存的必备辅助工具。古代中国，人们对器皿极为重视，不仅努力完善它的物质属性，更附加了复杂的精神内涵，为其设计制作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发展，中国古代器皿的造型样式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造型样式，拥有一个庞大而驳杂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发展历经上万年，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相伴而行，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如何产生、发展、完善、成熟并最终定型？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中国的器皿造型样式自成体系，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在器皿造型样式产生的石器时代，尤其是陶器产生以后，中国的器皿造型样式即已初显自己的特色。虽然在此后（尤其是西晋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但最终外来因素仍被吸收，融合到以汉族为主体的器皿造型样式体系中。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之所以呈现这一特点，与众多相关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器皿造型样式与各种相关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些因素都有其产生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它们又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中国古代器皿造型发展变化的各种现象，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演变的潜在原因，准确把握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借鉴以往的设计形式、设计语言及设计方法。

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历经上万年的发展，能够一脉相承、绵延相继，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原因之外，器皿造型样式自身的发展规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每种造型样式都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拥有保证其传承与传播的内在机制。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有些器皿造型样

式变化不大，而有的中途消失，有的隔代流行。不断有新的造型样式产生，又不断有旧的造型样式被淘汰。这种更迭与变迁，使得每个时代的造型样式均有一定时代特色，也使整个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富有活力。但总体来讲，多样的传播方式是很多造型样式得以延续的有力保障，也是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呈现较强统一性的重要原因。在庞杂有序的表现之下，器皿造型样式是如何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器皿造型样式记录和传播方式又有哪些？探寻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记录、传播、变革的途径与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器皿造型稳步发展并保持强大的活力、不断完善的原因。

总结归纳中国古代器皿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论述古代器皿造型的设计方法和技巧，并结合经典器型个案加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器皿造型产生、发展、成熟、演变的过程及规律。这对于丰富器皿设计理论知识、完善中国设计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器皿造型样式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体系的发展和延续。当代设计师若能熟悉古代器皿造型样式，吸取其设计经验，就能够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设计思路和方法。这些经验和参考，对于当代器皿造型的设计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现状

1. 古代对器皿造型的著录与研究

器皿制作在古代文化中的边缘性，使得典籍对器皿造型的记录和研究所涉不多，且多文字描述而少图形。随着古代器皿与礼制的结合，政府通过掌握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集全社会之力，对与礼仪制度相关的器皿造型进行考订和修正。一批较为系统全面的著录被编撰修订出来，如《考工记》《三礼图》《新定三礼图》《博古图》《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等等。中国古代自宋以后，官方对器皿造型样式的研究和记录较为详细。“在手工艺产品的生产中以彩绘图像为官样，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开始流行，随着官府手工业的确立和发展，官样一直是官府手工业生产中从事制作的样本，它们既可以决定产品的样式，也影响生产的规模和产品的质量，历代各朝还有相应的措施和管理制度。”^[1]官方甚至皇帝对样式的研究和记录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好的样式，常常要求妥善保留。雍正皇帝曾下旨：“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

[1] 郭玉昆，《官样与清宫御瓷》，《收藏家》，2007年第10期，3页。

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1] 尽管官方有关器皿造型样式的著录，多出于国家礼仪规章需要或统治阶层喜好而编订，并非出于以此为对象的研究目的，但这些典籍文献为当代相关问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掌握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但他们大多不太热衷于工艺技术，对器皿造型样式一般不感兴趣，故宋代以前文献少有专门的著录。一些学者在文献中涉及了器皿的名称，如《墨子》《左传》《国语》《礼记》《吕氏春秋》等，但大多没有对其进行详细描述。宋代金石学兴起和图学发展两股潮流，使这种现象出现了历史性转折。金石学建立了一套收集、整理、鉴别、考订、刊布铜器资料的方法，并保存了一批金石著作。宋代收藏和研究金石成了官僚文人的一种雅好，“金石”成为学术上的专有名词，收集研究铜器石刻之风开始蔓延。宋代文人学士也开始重视实物图象的研究，并把它和文献资料相佐证。如郑樵在《通志·图谱略》“索象”篇里提到：“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2] 图学类著录正确地运用图示法表现出器皿的形状、大小、规格和材料，并按一定的投影方法和技术规定表达在图纸上，使图样完全脱离了绘画和粗略示意图的形式。许多专著也附有图样，如涉及器皿造型图式的《考古图》《续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等。

[1]《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朱家潜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3年。

[2]〔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第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

2. 当代对器皿造型及其样式的研究

学界至今以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较少，从设计学角度对其发展规律展开研究的相关成果更少，但也有部分与此课题相似或有交叉的学术成果。现阶段对器皿造型样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造型设计的具体方法，对经典案例的设计原理、材质、功能、审美、文化、风格等方面的艺术学评价和规律探寻，各种造型样式的图式分析，具体器型的考古学和设计学角度的专门研究，各种材质器物的通史类著作等几大类。

（1）侧重于器皿造型设计技法探讨类著作：杨永善先生《陶瓷造型设计》，着重于陶瓷造型设计的基础知识、理论、方法和技巧的论述，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阐明了陶瓷造型设计的各种法则和规律；王琥主编《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将该研究所涉及的器皿划分在饮食器具和居所器具之内，选取了倒流壶、耳杯、爵、尖底瓶等经典案例，

对其结构设计、工作原理、材料工艺、视觉设计、文化寓意、延展案例、考古成果、既往研究成果、设计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

(2) 对器皿进行艺术学角度研究的专著:高丰《中国器物艺术论》对中国古代各种材质的器具,从功能、审美、文化、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各材质的器物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肖丰《器型、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选取了晚明这一历史阶段,以社会学、图像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认知思维和研究方法,考察了景德镇瓷器造型与纹饰的变化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和社会信息;王琥《装饰与器物造型》侧重于中国古代陶器、漆器、金属器、玻璃器等器皿与外国同类器物的造型与纹饰的联系对比。

(3) 以器皿造型为主要内容的图录类著作:吴山、徐思民所著《中国八千年器皿造型》对八千年的中国古代器皿主要造型进行了绘图,并对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概述;高丰、程晓平《中国历代器物图册》对从原始社会到近现代的一些典型器物造型及纹饰进行了图绘;刘萱堂、魏素兰、童志国等绘制的《中国古代器物图典》以出土和传世文物为依据,侧重器物的造型、用途、纹饰变化,几乎每件器物均注明时代、名称、尺寸、出土地点和收藏处所。《中国陶瓷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中国漆器全集》《中国工艺美术全集》等精选全国各博物院、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各类经典器皿彩色图版,翔实介绍器物的时代、出土时间及地点、主要尺寸、形制、工艺和装饰纹样,是目前国内外中国器皿最全面系统的一批图册。

(4) 对某一时代或某类、某种器皿造型专门研究类的著作及论文: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等专著;陆军《宋代梅瓶研究》、田旭《秦汉青铜容器研究》、阴玲玲《两周青铜匜研究》、胡嘉麟《两周时期青铜簠研究》、王文娟《商周青铜觚研究》、毕经纬《山东出土东周青铜礼容器研究》、郭菲《中国古代碗的造型发展研究》、张予林《陶瓷碗类造型的发展演变研究》、周亚东《宋代建盏艺术研究》、谢珊维《扬州日用漆器的造型演变研究》、乐明亮《清代康、雍、乾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造型研究》、龚晓芸《关于我国传统陶瓷饮水器具形态演化的研究》、宋玉立《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李智瑛《宋代饮食器的造型设计研究》、赵德云《汉唐时期中国瓷器造型中罗马文化因素的初步考察》等硕博论文。

(5) 工具书类的书籍则有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器型部分,按照陶瓷类器皿先圆器后琢器的顺序,对历代出现的完整器型及器物局部造型进行了词条编撰;方彝等编著的《瓷器器型识别图鉴》介绍了瓷器器型基本知识,对各种瓷器造型样式的特点、大致发展状况以及典型器图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编撰。

(6) 包括器皿在内的各种材质器物的通史类著作一般对各时代器型和纹饰进行总结,如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马承源著《中国青铜器》、张荣著《古代漆器》、贺云翱著《中国金银器》等等,

均侧重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器皿的器型、纹饰、工艺等演变过程及其独特的风貌。

二、研究的方法

（一）建立在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的造型样式分析

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口沿、颈部、肩部、腹部、底足等主体部分，器盖、耳系、环纽、流（嘴）、把（鋈）等附件，以及整体高度、宽度、各部分结构比例、轮廓线曲直等设计要素，由此形成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审美特征。对整个中国古代如此庞杂的造型样式进行面面俱到的详尽分析，是一部专著所难以承担的。现代设计史论研究方法一般概括为三点：

“形态分析（涵盖视觉所涉及之纹饰分析、设色分析、构成分析、文化寓意分析等），材料分析（涵盖质地所涉及之人造肌理分析、天然材质分析等等），构造分析（涵盖使用功能所涉及之工艺流程分析、专用工具分析、关键技术分析及动力原理分析、操持方式分析、应用范围分析、物流方式分析等等）。”^[1]在此基础上，还要看到这三点共同构成整体的一面，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因此对器皿造型样式的形态分析，要与材料分析和构造分析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割裂。将样式作为一种指认器皿造型的标志特征，有助于描述、分类或研究。但这种描述是不太容易量化的，因为中国古代工匠的设计是凭经验的，他们通过日积月累的感悟和从经验中提炼出的技术，在感觉的支配之下设计、制作出各种器皿。对中国古代器皿造型的研究，我们最好是将其还原回本身的设计生产过程，从而用带有一定程度模糊性的“样式”去描述、概括，这一工作又可以建立在以相同对象进行研究的考古类型学基础之上。

考古类型学是整理分析考古学资料的一种科学方法，又叫考古形态学或标型学，是“研究物品（包括遗迹和遗物）外部形态演化顺序的方法论”。^[2]19世纪下半叶瑞典人奥斯·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最先运用较为完善的类型学方法^[3]研究欧洲的史前工具^[4]，其著作当时在国内有两个译本：1935

[1]王琥，《与中国传统设计的一次对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3期，31页。

[2]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54页。俞伟超还对“考古类型学”做过详细的分析，认为类型学除了指利用器物的外部形态这个属性对遗物进行分类和排序研究外，遗物本身还有诸如制作技术、材质、功能、重量、时代等很多属性，这些属性也能够作为划分类、型、式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将根据器物形态进行的类型学研究称为形态类型学研究，将根据制作技术进行的类型学研究称为技术类型学研究，将根据功能进行的类型学研究称为功能类型学研究。

[3]类型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表述为：“一种分组归类的方法体系，通常称为类型。类型的各个成分是用假设的个别属性来识别，这些属性间相互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包罗无遗——这种分组归类的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一个类型可以表示一种或几种属性，而且包括只是对于手头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特性。”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6年。

[4]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理论假设在人工制品设计上的变化是一个逐渐递增过程：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设计，而且临近的文化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根据当时流行的文化历史学理论方法，蒙特柳斯建构了一个文化间相互影响和相对年代确定模式。一旦其中某一两个人工制品的绝对年代被确定，其余的相对年代亦可确定。类型学首次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于考古学的断代与编年。

[1] 张忠培,《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32、177页。

[2] 李科威,《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和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2页。

[3] (瑞典)蒙特柳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37年,20页。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和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考古学研究法》(郑师许、胡肇椿译)。随后中外众多的考古学者均对类型学方法进行了实践,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发展。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方法论包含的基本原理为地层学原理、相似发展概念(即进化论原理)、谱系学原理、形态学方法(即表型分类方法)、传播和入侵概念、比较学方法、年代校准方法。这套方法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并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被中国考古学家们运用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论,与地层学一起被喻为中国近代考古这架马车上的两只轮子^[1]。中国类型学增加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发展了形态学,增加了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内容:考据方法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包括金石学、训诂学等)、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即增强的形态学方法)、区系类型方法(加强形态学的地域概念)。

考古类型学一般根据包括器皿在内的出土物的外部形态,进行较为细致严谨的类、型、式的划分。其过程一般为四大步骤:合并相同器物,化简发掘资料;按照分类原则分类,使离散状态的标本变得符合某种秩序;选择典型标本或典型特征,给出型式分类后的器物的编号,用序号的关系特性来标明标本的时空亲疏关系,形成一个序号框架;用类比方法校准时代次序或文化属性,给框架中的某些点定性,以点带面将整个序号框架安插到“历史”框架的合适位置中去。^[2]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在接受和解释考古资料的信息,对器皿造型进行类、型、式的分类和排序时,会按主观意识对考古资料信息进行取舍、解释和整合。所以类、型、式的划分必然受到各自分类标准的影响而有所不同。蒙特柳斯曾经说过:“为欲明了各种体制就其特有标准判断时是依着怎样顺序排列,于是我将武器、用具、装饰品、容器等物连同它们的纹饰,依我自定的顺序,逐一编排出几个重要的联类。”^[3]从他的一番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分类和排序只是为限制和解释考古材料提出的假设,受到个人因素的很大影响。另外如果对器皿造型的类、型、式一味细分下去的话,对于总结归纳没有太大的裨益。

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选取宏观的角度,建立在一般的考古类型学学术成果之上,对器皿造型样式的类、型、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用“样式”这一概念对其进行归纳。基本按照各类器皿造型样式出现的顺序进行研究,以其发展演变与生产工艺的更替、材料的拓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观念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重点,必然要舍弃一些局部造

型样式的变化。所选取的器皿往往是排除地区差异的，关注的大多是代表时代风格的先进地区较早出现的或成熟期的造型样式。对这种器皿的造型样式作为名词蕴含的大量信息，包括风格特征、流行时间、传播地域、发展演化过程、使用范围、使用方式等等，进行“样式”名义下的整理和研究。这些信息表明了一种器皿造型样式与另外一种的差别，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时期亦有一定的差异。以造型样式本身的发展演化为主线，探索这些信息与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中总结出器皿造型样式发展演化最为本质的规律。在规律的论述中也淡化类、型、式，而尽量使用器皿的名称或样式的名称，使人们更多地联想到较为完整的器皿样式，而不是条块分割的类型。

（二）借助文献对出土及馆藏古代器皿实物进行辅助解读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古代器皿，实物资料主要分为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两大类。传世品多有赝品充斥其中，带有大量扰乱信息，因此只选取已被多方证实无误并广为认可的发掘品。经现代考古学科学方法获得的考古资料，不仅来源可靠，而且记录了现场出土情况，经过了考古及文物工作者严谨扎实的初步整理研究。这些一手实物资料，往往带有出土地点、所处时代、地层关系、共存器物等相关信息，为全面准确地分析提供了可靠而具体的依据。馆藏文物是被古代专门机构和近现代文博单位精心征集和保存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精美图册并附带了详尽的测绘信息，众多专家学者还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出版。这些资料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基础，是正确逻辑推理和科学合理结论的前提条件。一般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存在均有其上限与下限时间，确定这一问题的最可靠依据是考古发掘的综合信息。古代对青铜器、瓷器等器皿的研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往往采用的资料都不是发掘品，且对古代文献的依赖性较强。随着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逐渐积累了大量有发掘记录的材料，科学价值有较大提高，研究工作也更为合理。

但考古学的资料分析亦有一定的局限，多从器物资料本身进行分析，缺少对器皿设计制作角度的“人”的因素的考虑。正如尚刚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工艺美术是为人制作的……考古学再博大、再严谨，也无法借以说明工艺美术史的所有问题。我热望能以实物为中心，用历史文献解说实物，填充现有实物的空缺，尽心复原古代工艺美术‘人’的因素，阐释若干名词的真义。在此基础上，试图讲清一个时代有什么；遇有可能，

再说明一些重要的现象为什么发生在此时而非彼时；它们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1]这一番论述指出了“以实物为中心、历史文献解读实物、探讨其规律的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古代所留存下来的一批文字和图片资料，其时代比现在更为接近所记录的器皿时代，有一些文献资料甚至是当时的书面记录，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可靠性较强。但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受作者的学识、研究方法、材料科学性以及时代因素的制约，并且在文献流传的过程中，因年代久远和辗转相传，产生谬误在所难免。在历史上的特定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当中，一些记载和阐述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附会与不实成分。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一些冗余甚至错误信息的产生，如果不加辨别会使错误被延续。因此在使用古代文献时，尽量与现代考古学出土实物相对应，客观还原器皿所处时代的历史信息，合理推导器皿造型背后相关因素的逻辑联系，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研究方法。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及论文基本结构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器皿是两个非常古老的、各自单用的字组合成的词，它的含义受到这两个字的很大影响。《易·系辞·上》有“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2]，将器看作一种可以为民所用的、具有实际功能的用具。《易·系辞·上》还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将器的范围扩展至与“道”相对的有形的具体事物，成为一个哲学命题。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器多有涉及，主要有具体用具和名物制度两种含义。《第十一章》有“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此处两个“器”的含义分别为陶器和盛物之器具，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最为接近。^[4]《第五十七章》有“民多利器，国家滋昏”^[5]，“器”在这里指可使用的器物，“利器”即可图利的器物，进一步可以延伸为可作为商品的器物。孔子对“器”的有关言论有：“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6]文中所言之“器”，是个实物，但因其藏“礼”，又成为一种象征，这种“器”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非常多见。《六艺之一录》提到《说文》中对“器”的解释为：“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7]这里器字尚与犬有关，大概是较为接近其本义的，可信

[1]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9年，355页。

[2]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82页。

[3]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83页。

[4] (春秋)老子，《道德经》卷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5] (春秋)老子，《道德经》卷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6] (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7] (清)倪涛等，《六艺之一录》卷二百五十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与否尚存疑问,但后来与犬的关联逐渐消失。器皿最为普遍的含义是指饮食用的器具。《墨子·节葬下》有“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1],《孟子·滕文公下》则有“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也”^[2],《孟子注疏》的解释为:“皿,所以覆器者也。”^[3]《御定渊鉴类函》称皿为盘、碗之类的饮食器:“皿,饭食之用器也,象形,与豆(簋)同意,凡皿之属皆从皿。”^[4]综上所述,器皿一般指的是以饮食器为主的盛东西的日常用具的统称。

器皿造型,也称“器型”或“形制”,是指根据各种需求,以明了的观念,利用不同的材料,采用不同的工艺技术,设计和制作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的器皿外部形态。“任何实在的物都有形的存在,形是视觉可见的,触觉可触的……任何有意识地去创造形象都可以称之为造型。”^[5]按照现代设计观念的分析,器皿造型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点、线、面、体,器皿造型样式的变化也就是这些要素形态改变和组合改变的结果。“人们通过这些单位或要素的集聚、删减、分割、变化或扩大、缩小、形变等手段,便能产生出千变万化的形态。”^[6]自从器皿产生之后,人们通过对其进行无数次的加工,其造型作为器皿突出的特征反映在人大脑中,反复不断地进行刺激,逐渐使人产生了造型观念,锻炼了造型能力。在不断的设计、制作、使用、感知的过程中,对造型的认识和把握水平不断提高,设计和制造美的造型形体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中国古代器皿的造型样式发展得越来越丰富和完善。

造型作为器皿外在艺术特征的两大因素之一,与随时代和地域快速变化的纹饰不同,它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强稳定性,而这一稳定性的直接决定因素是造型样式的存在。正如雷德侯对青铜器设计的分析:“能够发现青铜器设计者发挥创造性的余地是有限的。在他进入角色之前,器物的整体结构——形状、比例和大小——都已经决定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要求工匠变更传统类型。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严密的框架中工作。”^[7]这种所谓的“框架”也就是“样式”,在中国古代设计史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造型和纹饰中都大量存在。扬之水也曾对此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而中国古代关于设计一事,我以为,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项,即一为法式,一为样式。”^[8]但她在看待二者的关系上,认为样式是在法式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样式”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里没有记载,有关的只言片语基本上也是将两个字分开的,其词义以“样”的含义为主。辞源对“样”的解释为:

[1](战国)墨翟,《墨子》卷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

[2](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3](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4](宋)司马光,《类篇》卷十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字画之属。

[5]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湖北美术出版社,武汉,2002年,62页。

[6]李砚祖,《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18页。

[7](德)雷德侯著,张总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54页。

[8]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二,中华书局,北京,2011年,238页。

[1]《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876页。

[2]《魏书·源子恭传》,有“造样”;《隋书·礼仪志》,有“白马寺宝台样”,《历代名画记》有“器物样”“陵阳公样”“史小静起样”“生铜作并蜡样”“毛婆罗样”“张阿干蜡样”等等。

[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4]徐飏,《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2008年,131页。

[5](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六十八,列传之三十三,何稠传,第六册,中华书局,北京,1973年,1599页。

[6](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7]《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561页。

[8]《尚书·说命》:“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尚书·周书·微子之命》:“世世享德,百邦作式。”《说文》:“式,法也。”《大宋重修广韵》:“式,度也。”基本上包含了式样与规范、制度两种含义。

[9](日)长广敏雄,《什么是美术样式》,《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61页。

“凡制造器物的模型、绘图的稿本等都称‘样’。”^[1]古典文献对美术及建筑的“样”有一些记载和论述^[2],其含义与器皿造型样式设计所涉及的“样”大略相同,可以借此来推断古代器皿造型的“样”。《考工记》里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3],“述”即遵循的意思,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把造物活动视为循法依章的规范化活动。徐飏曾对此有论述:“器物的制式大体上是现成的,因而制造过程往往超越了‘造型设计’阶段,直接进入制作阶段……这也反映了一般成器活动对已有规范有着很强的依赖性。”^[4]关于“样”的表率和影响作用的记载,《隋书·何稠传》有:“凡有所为,何稠先令亘、袞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5]李肇《唐国史补》有:“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6]“式”在辞源中的解释为“规格、榜样”^[7],在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相关文字涉及。^[8]“样式”的大部分词义与所谓的“样”含义基本等同。

某种“样式”确立并被认可之后,往往会被广泛传播并被不同时代、地域、流派的工匠所采用,甚至上升为被政府确立的标准和规范。样式对中国古代的器皿来说,是其造型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的重要条件,也是保持较高艺术水平和使用价值的有力保障。样式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器皿造型设计中不容回避且广泛存在。在一定地域或一定时代,出现一定数量的某些造型相类似的器皿,明显不同于其他造型,这些器皿所具备的群体特征即可视作一种样式。“美术史、考古学上的样式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即地域或国度、时代、流派、个人”^[9],追溯各种样式的来源,大约最终只能归结为这四个方面。某一地域或国度、时代、流派、工匠个人的生活环境、工艺技术、审美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器皿造型样式。

(二) 研究对象的总体描述及分类

在我国悠久的器皿发展史中,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无数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器皿造型样式。其发展演变是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物化反映,每种器皿造型样式,都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古代器皿的分类及器型非常繁多,在交通条件落后、区域分割复杂、小农经济制约及作坊经营方式等条件之下,器皿造型样式极为多样,研究难度较大。如果要从中寻找一些发展的规律,面对的是纵向上下逾万年,横向幅员辽阔,几乎涵盖中华大地生产的所有器皿的研究对象。